

王东京 主编

2012年

第 1 册

中国经济观察

解读**中国经济**的另一种视角

资源税改革重在配套

发展**文化产业**应当分类调控

社会企业**能上市吗**

当前农村发展的**九大焦点**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2012年 第1册

中国经济观察

王东京 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观察. 2012 年. 第 1 册/王东京主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035-4733-1

I. 中… II. 王… III. 中国经济-文集 IV.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4042 号

中国经济观察 2012 年第 1 册

责任编辑 曲 炜 楚双志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高 鹏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字 数 15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37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珏	江小涓	刘伟	刘海藩
李兴山	张卓元	张尧学	林毅夫
顾海良	梁小民		

主编 王东京

副主编 赵振华 (常务)

韩保江	潘云良	孙小兰
-----	-----	-----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安培	王天义	王东京	王国平
王健	孙小兰	宁向东	张军
张维迎	陈甬军	陈晓红	杨秋宝
杨瑞龙	郑介甫	柳欣	赵振华
洪银兴	顾海兵	黄少安	梁朋
韩保江	谢鲁江	潘云良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永臻	王君超	石霞	田应奎
刘振英	刘艳梅	李蕾	李继文
李省龙	李旭章	李鹏	张玉杰
张燕喜	陈文通	陈宇学	赵锦辉
施虹	胡希宁	徐平华	徐祥临
贾华强	袁辉	曹立	曹新
郭威	董艳玲	鲍永升	

热点聚焦
Hot Spots in Focus

中国经济施政选择
Policy Options for China's Economy

王佳宁/ 3

发展文化产业应当分类调控
Regu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dustry According
to Classification

刘春雷/ 20

改革与发展
Reform and Development

解读中国经济的另一种视角
Another Perspective into China's Economy

王东京/ 29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亟需“顶层设计”
Top-level Design Necessary for Basic Public Service Equalization

梁 朋/ 38

中国经济何以成功转型
How to Make a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y

祁 斌/ 44

资源税改革重在配套
Supporting and Coordinating Measures Crucial to Resource Tax Reform

贾 康/ 55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Getting Rid of Middle-income Trap

李方旺/ 60

探索与争鸣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

当前农村发展的九大焦点
Nine Key Aspects of Current Rural Development

党国英/77

社会企业能上市吗
Social Enterprises Can be Listed

汤 敏/90

“耕者有其田制度”何去何从
Prospect of the Land-to-the-tiller System

徐祥临/98

既要保增长又要保公正
Maintaining Growth while Keeping Fair

姜 波/108

增加就业与反歧视
Increasing Employment and Anti-discrimination

顾海兵 王鑫琦/116

房地产市场面临重新洗牌
Real Estate Market Facing a Reshuffle

巴曙松/125

管理前沿
Forefront Management

美国金融危机再反思
Rethinking America's Financial Crisis

胡培兆/135

人文管理杂谈
Chat about Humanistic Management

于省宽/144

调研报告
Report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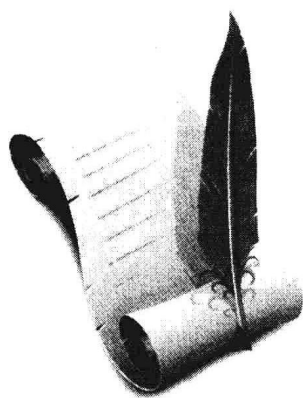
灾后重建：汶川样本与启示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课题组/157

the Wenchuan Sample and its Implication

热点聚焦

Hot Spots in Focus



中国经济施政选择

王 佳 宁*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泱泱大国已渐次涉入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水地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宋代学者张载的“横渠四句”引申，以经济和社会理性为指针，尽最大可能告别能源、生态、发展与生存危机，摆脱为争夺资源、财富、地位而形成的政治、社会及心理危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施政过程的率先选项。

一、宏观大计的限度与后续

因应当下全球经济情境，任何一个经济体难以独善其身。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如何体现针对性，经济政策如何在积极、稳健、宽松和紧缩间拿捏，既关联中国经济一个时期的路径，也将显现对世界经济的

* 作者系《改革》杂志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执行总编辑，编审。

相关效应。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机构与高校，宏观经济学则被总量经济学替代。事实上，当政策面谓之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其核心是宏观经济的总量关系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宏观调控皆与总量关联，因应政策面关注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宏观调控已成为官方拿捏经济走势的特定方略。而笔者拟试探性作这样的注解，排除经济学或管理学学科因素，政府按层级依序列，也相对应地体现为宏观和微观，即下一级政府做的是微观的、具体落实和具体表现的事情，而上一级政府做的是宏观的、要求下一级政府执行的事情，只不过，宏观调控的权力悉数在中央政府。作为调整经济变量的一种手段，经济政策的特殊定位即时宜性，其制定主体类似历年来的宏观调控。因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央行轮番亮相就经济政策放话，公众也已习以为常。

从经济学角度观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往往滞后于经济周期，削弱宏观政策反周期的功能。改革开放 33 年来，政府干预、主导经济的种种手段至今仍未避免，这是渐进式市场经济国家与成熟型市场经济国家的重大差异。尽管我国属于前者，但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的哪些干预是当下和未来必须一以贯之的，政府哪些主导经济的手段在现阶段较弱而未来是需要强化的，政府的哪些干预是当下必不可少但未来必须淡出的，政府的哪些主导经济的手段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都必须“退出”的。上述应该成为 2012 年宏观大计的重要基调，甚至间歇性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定依托。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往往扮演推动者的角色，而各层面官员须具备对应的新思维、新思路和新方法，至为关键的前提是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对中国经济轨迹、区域新格局有深入了解，对重要经济资讯有第一手掌握，有长时期的观察和跟踪，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冷静的判断，方能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意见和看法。2010 年，

新兴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总量接近 50%，而中国的角色更加独立。依现阶段经济总量，笔者预测到“十二五”规划末期的 2015 年底，有可能提前 5 年实现 2020 年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按不变价格计算，2020 年的 GDP 比 2000 年翻两番）。

所以，在准确判断 2012 年经济走势的前提下，宏观调控的方向需要校准，力度和节奏需要适时适度宽松，从而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的合理增长，压缩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涉及要素方为肯綮。依上述引申，对 2012 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建言或前瞻者，均需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特殊的政治生态、民意诉求有大致上的脉络梳理，特别是对宏观调控演进轨迹的熟稔，而不是蜻蜓点水般回应舆论，甚至发出全球经济将二次探底的稚语。

二、深水区改革呼唤顶层设计发力

“顶层设计”出现在高层重要文献中，始于 2010 年 10 月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

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顶层设计”相联系。推进企业、财税、金融、投资、中央与地方关系、农村、对外开放和事业单位改革，等等，“顶层设计”是重要前提。“顶层设计”的对象一般指某一体制。从“裁撤机构”到“界定职能”、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从“裁判员”到“守夜人”、从“投资冲动”到“宏观调控”，不同时期的“顶层设计”实乃中国转型和发展的有力注脚。从凯恩斯时代到福利国家兴起，政府责任逐渐变大。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中赋予了政府四大职能：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和帮助贫困人员。而弄清说透这些职能中的要素，正是现时解读“顶层设计”的要旨。

关注民众福祉应成为“顶层设计”的重要着眼点。自下而上观瞻，依据既定的计划、原则和办法行事的能力谓之执行力，这是把理

想变成现实，把计划变成看得见、能够分享到成果的过程。执行力的要旨即责任。如果执行力就是政府的运筹能力、行动力，那么，智力、魄力、胆识与毅力无不构成对待执行的态度，所谓欲做大，必做细。组织行为学大师保罗·赫塞曾指出，“执行力”问题就是“领导力”问题！而将权变领导理论应用于“顶层设计”，其有效性不单纯取决于领导者的个人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执行力、领导力是实施“顶层设计”的重要前提。纵观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一个日益强盛的民族、一个通达开明的政府，他们都拥有坚定执行力、领导力直至负责任的“顶层设计”。

从哲学上看，“顶层设计”可以说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决策主体的知识、思维、行为及其艺术的一种对象化活动。“顶层设计”是人类改造特定对象而取得的一个重要认识成果。《资治通鉴》系反映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决策经验与教训的重要典籍；《孙子兵法》则是春秋战国时期大小频繁的千百次战争中决策经验的总结，它指导将帅如何对战争进行正确的选择与决策。无疑，“顶层设计”将为深水区改革提供自上而下的高端方法论。

由上引申，“顶层设计”的价值判断视域切合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双重分析，二者具有内在的关联。在社会价值体系范围内思考“顶层设计”，将其与社会价值评判的现实条件结合在一起是科学性的必然结果。如是，才能将“顶层设计”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同时“顶层设计”又是一个参与的过程：需要各利益群体和个人参与政策的讨论和政策的制定，参与政策实施，这些参与者在实施“顶层设计”的过程中或者获得一部分利益，或者失去一部分利益，但不再计较既得利益。正所谓改革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顶层设计”涉及的制度变迁的阻力则在于变迁需要付出成本，不过，其精髓依然不会变。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诺斯首先发现，制度变迁的动力存在于新制度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增加产出，使许多

人得益。因此，各种成功的改革模式、改革经验，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良性效应将被长期受用。因为无须掩饰，人类生活和生产使用的产品，随时都可能更新换代，犹如电灯问世油灯熄灭，轿车上路牛车安息。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风靡全世界的摇滚乐至今难以和浸润中国心灵的《诗经》、《楚辞》匹敌；一部《红楼梦》也没因各种表现形态的西方文化渗透而香消玉殒。

国家财富巨大增长的过程，实质是逐渐引入竞争、公众有了更多选择机会的过程。在“顶层设计”即将发力之际，不管我们是否在繁忙或压力中迷失自我，都必须明明白白：历史从来不是事先给定，它需要主动的参与和创造。

三、“共同富裕”的思维主轴

在经济理论界频频触及发展话题，以及最近一个时期对改革成效和改革走向的论争中，绝大部分亲历改革进程者赞同为已经进行 33 年的改革成果“加分”。问题是，在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坚持深化改革为唯一取向的大背景下，必须认真考量如何使改革和增长的速度更合理，如何促进共同富裕。

作为一种良好的价值诉求，“共同富裕”是可持续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逻辑。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 90 周年重要讲话中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

作为一种执政理念，“共同富裕”凸显当代政治家正视现实的勇气与智慧。“共同富裕”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延伸，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是以人为本，这正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将“共同富裕”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遂“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在战略意义上，“共同富裕”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共同富裕”是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正如《孟子·尽天下》主

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然，“共同富裕”必须以较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又非单纯的经济发展一蹴而就的。尽管学术界对社会协调、社会团结、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研究由来已久，然而，如何在市场经济和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无论对理论还是实践，都是一个新命题。

“共同富裕”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顺应社会和民意的明智选择。“共同富裕”的首要因素是财富分配，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事实上，差别不大是正常的，差别过大则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必须整合阶层利益：在减少低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鼓励合法合理的方式致富的同时，利用财政、税收、保障、福利和救助等工具进行调节，实乃实现“共同富裕”的肯綮。

一项构思精良的法规或政策投入运行后究竟有什么效果，其实际效益和效率如何，唯需现实检验。“共同富裕”可以在一定层面上保证政府官员对社会规范的带头遵循，无论这种遵循是出于道德性自觉，还是出于现实功利的考虑。

四、“分好蛋糕”关乎心理抚慰和全民福祉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当下，象征社会财富的“蛋糕”被毅然端上“桌面”。“分好蛋糕”即财富分配如何合理，此举于决策者和政府职能部门义不容辞。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分配能否通达相对公平的路径，直接关联社会稳定。设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实现和谐社会愿景的必由之路，“分好蛋糕”则关乎心理抚慰和全民福祉。

尽管布坎南开创性地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政治领域，并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但迄今，“分好蛋糕”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其难度在于“分好蛋糕”的体制机制尚未建构到位，如财税体制、社会福利体制等，以致政府部门或公共事业部门的目标一直是多重的。因

而，“分好蛋糕”须冷静辨析主观努力、客观环境和工作结果。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是以人为本，这正是“分好蛋糕”的必然要求。亚当·斯密把政府比作“守夜人”，认为其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安全。从凯恩斯时代到福利国家兴起，政府责任逐渐变大。由此，在战略意义上，“分好蛋糕”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

“分好蛋糕”也是顺应社会和民意的明智选择。随着中国转型与发展，社会问题大量出现，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愈加显性化。“分好蛋糕”是对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矫正。从这个意义引申，做好蛋糕仅仅表现为技能，而“分好蛋糕”直接牵涉品德和良知。因此，不“分好蛋糕”，就难以产生“做大蛋糕”的动力。而让公众参与、融入这种动力，心理抚慰必不可少。心理抚慰可以促使个人通过增进公共利益的方式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形成正和博弈；相反，不进行心理抚慰将导致人们以损人利己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导致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悖的零和博弈，甚至陷入损人不利己的负和博弈困境。心理抚慰需要改变的不仅是财富和资产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还有针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出台的消费政策，官方面临如何精准思维和推介的考量，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应该包含“心理抚慰”这一课，不知何地能拔此头筹？一如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 这同样适用于“分好蛋糕”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活动。“分好蛋糕”既是公众切身关心的问题，也吻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宗旨，是政权合法性的肯綮。

当宪政话语渐次达到共识层面，其功能正以维护公众的权利为基本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分好蛋糕”牵扯政策性非均衡发展。这种非均衡发展既强化工业过度增长，又使消费和就业受到限制。非均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发展主要表现为财政、金融资源主要流入大企业，流入中小企业的份额很低。这一政府（或市场）行为的结果必然严重制约中小企业的发展，限制就业机会的增加，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势必使改革和发展付出更大的失业代价。如是现象和行为直接影响对全民福祉语境的解读。

“分好蛋糕”于增进全民福祉似无悬念，增进全民福祉有赖于区域增长，而区域增长是一个非均衡的过程。1957年，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他认为如果没有适当的政府干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是倾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间的差异。孟德斯鸠也说过：“一个共和国，如果小的话，则亡于外力；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部的不完善。”要使“分好蛋糕”能免于因内部的不完善而出现这样那样的事端，就需要建设合宜的制度，来配置权力，避免过分集权或过分分权。从经济角度观瞻，适当分权的政府要做到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应该落实在适当的成本收益单位上。适当分权的政府，可使政府更为贴近公众的需要，切实履行为公众服务的责任，从而更好地实现配置效率；适当分权的政府，可减少“搭便车”的问题，进而有效地减少寻租的机会。

五、期待回归理性的中国转型新路径

当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公众看到的是私有财产基础日益增厚、诸多利益日渐多元的景况。而改革开放进程中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若干操作，以及社会形态由控制、封闭向渐次开放、开明转型，政府往往成为全社会的唯一责任人、社会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循迹筚路蓝缕，国人曾经拥有充分的理性。

而近年来，多起重特大安全事故相继发生，社会公众无不揪心。“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其事发和处理过程使得体制痼疾备受诟病，盖因在发展战略上缺乏冷静，缺失理性；2011年6

月，我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57%，成为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系有关部门决策不当、理性滞后所致。此间，被舆论抨击的案例接连出现：隔离护栏与路灯没安装完就通车的山东胶州湾大桥，试通车第二天就坍塌的云南新平县城至三江口二级公路，还有开通不足 10 天就把北广场数千平方米地砖全部敲碎拟重新铺设的京沪高铁南京南站。上述种种，皆因一些机构以速度就是效益、政绩为主臬，置理性于不顾。如是让人心寒的景象迫切期待理性的回归，这是大国推进转型的不二选择。

回归理性的背景在于均衡发展。均衡发展系经济学的的一个基本理论和普遍使用的分析工具。问题是，在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坚持深化改革为唯一取向的大背景下，必须认真考量如何使改革和增长的速度更合理，什么样的均衡发展才能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诚然，经济发展一般经历要素驱动、资源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过去若干年，由于种种原因，现代化被片面地理解为经济现代化，以致在许多官员的要务中，经济现代化又被简化为增长速度。然而，从一些国家现代化历程看，有的出现“高增长、低发展”情形，有的甚至落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

自马歇尔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一直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经济学在中国改革 30 多年来大致可谓应用得体，即已不是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是否用价格实现资源配置，更本质的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同，尤其是后者。所以，均衡发展的核心体现的是稳健发展，即步子迈得稳。稳健的“主流”取决于实体经济，这与市场经济特征相伴。不过，选择了市场经济意味着选择了与其相伴的经济周期。按经济周期逻辑，一个发展阶段之后通常表现为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公众似乎更期待高涨阶段的持久性。殊不知，市场经济是一种能够有效调节经济运行的体制，而危机阶段是对以往运行中积